

大国通史丛书

总主编 钱乘旦

英国通史

A History of England

钱乘旦 主编



【第五卷】

光辉岁月

—19世纪英国

刘成 胡传胜 陆伟芳 傅新球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大国通史丛书

总主编 钱乘旦

英国通史

A History of England

钱乘旦 主编

【第五卷】

光辉岁月

—19世纪英国

刘成 胡传胜 陆伟芳 傅新球 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通史. 第五卷, 光辉岁月: 19世纪英国/刘成等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214 - 17543 - 4

I. ①英… II. ①刘… III. ①英国—历史—19世纪 IV. ①K561.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4283 号

书 名 英国通史·第五卷 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
主 编 钱乘旦

著 者 刘 成 胡传胜 陆伟芳 傅新球
策 划 王保顶
责任编辑 李 洁
装帧设计 刘萼萼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mm×960 mm 1/16
印 张 186.25 插页 24
字 数 2 4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214 - 17543 - 4
定 价 660.00 元(全 6 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在英国全盛发展的时期。英国在19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开始引领世界潮流。经过19世纪社会各方面的变革，英国最终完成了构建现代国家的任务，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

19世纪英国的经济发展受经济理论的指导，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英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突飞猛进，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英国建立了强大的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机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自由贸易政策的确立，使英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竞争优势，为大宗工业品的输出和大宗原料、粮食的输入准备了前提。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的中心。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它不仅是世界范围内资本流通的中心，而且是世界各地短期资本投资的主要目标，一个全球性的证券市场在伦敦形成。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外投资快速增长，起先主要流向欧洲大陆，后来逐渐转向殖民地、南美以及美国。在工业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英国也步入“高效农业”的时代，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高效农业提供了制度保障。1846年废除谷物法之后，英国农业加速了改良和结构调整，走上

集约化道路。到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农业进入最繁荣的时期。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逐步丧失,英国农业也进入困难之中,其普遍萧条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过,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和金融强国,在航运、国际银行业和金融业、海外贸易服务业方面仍占优势。煤炭、钢铁、机械工业仍在发展,造船业仍居世界首位。1870—1914年的经济衰落是相对而言的,英国仍在发展,其工业产量、世界贸易量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居于世界的前列。

19世纪的变化触动着所有人的利益,各个阶层都被卷入不同性质和内容的民众运动之中。激进主义者包括议会改革者、共和主义者、社会改良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这些不同的激进团体可能独立行动,也可能采纳或支持另一个激进团体的政治纲领或社会目标,其共同点是要求对现存制度作根本改革。议会改革是19世纪英国政治变革的一条主线,其根本目标是突破寡头政治制度,向大众民主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英国采用了和平变革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的平稳过渡。到19世纪下半叶,自由党和保守党竞相改革,主要是想从改革中为本党争取更多选民。

在19世纪,政党的力量凸显,为了组织全国范围的选举工作,操控本党选民,党必须加强领导力度,突出党魁个人的影响,同时着力进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工党是工人运动的产儿,出于各自的需要,工党和工会这两股新的力量联合起来,携手走上了英国的政治舞台。

司法行政改革也是大势所趋,通过持续的司法改革,英国建立起统一的现代司法体制;警察的组建降低了治安法官的作用,乡绅对农村的统治随之削弱。到19世纪末,英国确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现代政府管理机制建立起来,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主宰了社会意识形态,他们的生活方式主导了英国社会。土地贵族在财产方面仍占极大的优势,但是到19世纪晚期,他们在政治、军事领域里逐渐失去优势。工业

化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也创造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日益扩大的两极社会。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渐成主流,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世纪缔造了第一个城市化社会,也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城市化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方便,但也恶化了环境,从拥挤到疾病到犯罪猖獗,揭示了城市化这把历史大锤的正负效应。19世纪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宗教国家,从凡夫俗子到科学家、甚至进化论的支持者都是宗教的信仰者。工业化没有削弱宗教意识,宗教的影响反而加大了;然而,怀疑论甚至无神论也在悄悄地增长。在教育方面,牛津、剑桥仍然是贵族精英教育的堡垒,但中等阶级教育也得到发展,到19世纪晚期,大众教育和职业教育也有所进展。

19世纪的英国外交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捍卫英国的国际地位,二是保障英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贸易。在整个19世纪,各党派的外交政策有共同的原则,即保卫英帝国,维护强大的海军力量,保持欧洲均势。拿破仑战争让英国深刻地认识到,维持均势才能捍卫英国的安全,才能实现全球自由贸易,因此战后英国政府执行和平外交路线。然而19世纪中叶炮舰政策成为英国外交的主导,它凭借海军的绝对优势控制世界海洋,强制推行“自由贸易”,迫使全世界为英国的商品打开大门。该政策的始作俑者帕默斯顿并不主张四处出击,认为在不严重涉及英国利益的情况下,英国应尽量袖手旁观;英国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英国外交必须信守英国的永恒利益。

尽管如此,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外交影响力已不能与其经济地位相比。此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正迅速进展,英国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它必须依靠外部的资源来支撑自己,一旦其他国家进入工业化,英国就受到威胁。于是英国不再将国家关系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因素,而是全力保护帝国利益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孤立主义外交在英国单强独大时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一旦其他大国赶超上来,结盟外交就是英国的唯一选择。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成为无可匹敌的海上霸主,拥有巨大的殖民帝

国,这以后它执行无形帝国政策,不以扩大版图为目标,而以贸易为第一要旨。“炮舰政策”就是以此为目标的。70年代以后,随着其他国家工业化迅速进展,英国商品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英国于是开始改行有形帝国政策,投入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之中。在这个争夺中,英国成为最大的赢家,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到19世纪结束时,从版图方面看,大英帝国覆盖世界,英帝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但帝国解体的过程也开始了,白人移民殖民地离心倾向日益明显,最终转变成“自治领”;非白人殖民地的自我意识也在形成,到20世纪就转变成独立的要求。英布战争暴露了英帝国的虚弱,在帝国辉煌的外表下,不祥的阴影悄然聚集。

19世纪,英国的“软实力”十分强大,科学、文化、艺术都发展到历史的最高点,各种理论和学说纷纷出现,借助它的商品和炮舰传播到世界上许多地方。英国对世界历史的突出贡献集中表现在19世纪,正是在这个时代,英国走上了光辉的顶点,无论其成功还是失误,都为世界展示了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模板。

本卷主持人 刘成

2015年1月,于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经济

- 第一章 经济政策 3
- 第二章 工业与交通 22
- 第三章 银行与金融 47
- 第四章 对外贸易 62
- 第五章 农业 80

第二篇 政治

- 第一章 议会制度改革 101
- 第二章 社会民众运动 133
- 第三章 政治体制沿革 159
- 第四章 行政制度变化 177

第三篇 社会

- 第一章 阶级对抗 193

第二章 城市化与城市病	220
第三章 财富与贫困	244
第四章 人口、婚姻与家庭	262
第五章 宗教与教育	282

第四篇 外交

第一章 均势外交	307
第二章 炮舰外交	319
第三章 帝国主义外交	332
第四章 大战前外交	347

第五篇 帝国

第一章 第二帝国的发展	369
第二章 巩固帝国的努力	392
第三章 第二帝国的危机	413

第六篇 思想与文化

第一章 文学	441
第二章 社会思想	464
第三章 艺术与科学	487

附录

一 地图	501
二 大事年表	507
三 参考书目	512
四 译名对照与索引	534
后 记	553

第一篇

经 济

第一章 经济政策

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集中反映了同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和经济利益，并被用来为巩固和加强统治阶级的地位服务，19世纪英国经济政策的演变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从自由放任到国家适度干预，都受到经济理论的影响和指导。

19世纪英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自由放任时代以前，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是重商主义，它主张国家干预，执行垄断政策。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曾帮助英国成为欧洲强国，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重商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于是，突破重商主义的束缚，建立新的理论，就成为新时代的需要。

完成这一任务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主张政府退出经济领域，让经济完全“自由”地发展。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工业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它的指导下，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由于英国是第一个成功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因此亚当·斯密的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人们都把英国的成功归因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英国的模式是标准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历史证明，英国的模式不是唯一的模式，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就开始摆脱英国理论和英国模式，英国模式只是一种适合英国发展的工

业革命方式,它帮助英国顺利完成了工业化。

在斯密之前,已有不少人为摆脱中世纪的道德枷锁、建立适合新的社会变化的经济道德标准作出种种努力,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亚当·斯密则以他庞大的理论体系为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提出新的道德标准,斯密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六种基本动机推动的: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及交换,以此出发,他认为一切人的行为动机都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判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有按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自由。在这样的假设下,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即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富人虽然贪得无厌,雇用了千百人来为其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所做的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当神把土地分给少数地主时,他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遗弃那些在这种分配中似乎被忽略了的人。后者也享用着他们在全部土地产品中所占的份额。”^①依据此种理论,斯密甚至怀疑那些不是出自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的行为能否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他说:“我从未见过那些假借为公众谋利之名的人们作出了多大的贡献。”^②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被誉为“第一部伟大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这部经典著作中,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系统提出了全新的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该书的中心思想,是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看成是一个具有自行调整机制的体系,商品供求和价格都按照自由竞争的内在规律运行,若是自由竞争受到阻碍,那么自动调节就会

^①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0页。

^② 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5页。

受影响。因此他反对高关税，反对政府对商业和市场的干涉。亚当·斯密指出：“垄断乃是良好经营的大敌，只有依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使良好经营普遍确立起来。自由和普遍的竞争势必驱使各个人，为了自卫而采用良好的经营方法。”^①《国富论》把市场的完全自由抬高到不可逾越的地位，认为自由市场中的“经济人”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斯密认为人性是天生自私的，追逐个人利益是人的本能，在经济活动中，资本的“唯一目的”在于“牟取暴利”，当资本家使用资本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事后才达成一致的，利他是利己的产物。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最终就客观地获得了增进，因此社会利益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而“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指“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要求经济在“自然”状态下发展，生产在“自由”中竞争。这就是他所设想的理想的“自然秩序”，在其中，个人与社会完成了利益的最大统一。因此，政府应该创造一种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保障个人的经济活动，而国家对经济领域的任何干预都会对国家整体造成妨碍作用。

这就是“自由放任”理论。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③因此，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延福于全社会，他是不必为追求这种利益而感到羞愧的，因此，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放手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吧，在

^① 小罗伯特·B. 埃克伦德, 罗伯特·F. 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杨玉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页。

^③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4页。

自然规律的作用下,他会对公众利益作出最大的贡献!

“自由放任”理论为人们发财致富的动机提供了最好的辩词,当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工业资产者急于在一切领域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论依据,斯密学说为此种需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因此它一经出现,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他的学说很快为工业资产者所接受,成为其正统的经济指导思想。经济自由主义表达了他们埋藏已久的强烈愿望,他们高兴地发现,在斯密那里,追求利润变成了正常的伦理,自私的动机被说成是可以造福于社会的崇高目标,千百年来基督教教义中经商可耻甚至有罪的观念被打碎了,柏拉图式的或贵族式的高雅姿态也被清除干净。那种对财富强烈追求的欲望,现在被公开释放出来,这被哈佛大学一位经济史学家叫做“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①,正是在欲望的刺激下,人们急切地扩大生产,大大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斯密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学“古典”时期的开始,这个时期大致是从1776年《国富论》出版,延续到1873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之死。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其所持的原理即自由放任理论却成为那一时期人们坚守的信条。^②

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发展了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代表者,他把劳动价值论和地租理论发展到高峰,其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它的中心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李嘉图赞成斯密对国家职能的看法,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认为:经济本身具有自行调节的功能,因此应实行自由竞争。他认为国家的干预有害无益,因为“在没有政府的干预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最为繁荣”。^③如果一切国家都取消对经济生活

① 参见大卫·兰德斯:《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第二版),谢怀筑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

② 小罗伯特·B. 埃克伦德,罗伯特·F. 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杨玉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③ 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讯集》第八卷,寿进文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95、123页。

的干预,各国就都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各民族的利益就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增进。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①而且,“最能保障整体利益的莫过于把总资本作最有利的分配,也就是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②他说的“整体利益”指的是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换句话说,李嘉图极力主张在全世界实行自由贸易。

为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或相对优势的国际分工论。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国际分工原则是,各个国家应当只生产自身的自然条件比较有利的、成本比较低的商品,并用这种商品去与其他国家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其他商品。这种国家利益的追求很好地与全世界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生产总额增加,各方都得到好处,并且因为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连接在一起,因此文明世界中的各个民族就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在李嘉图看来,即使效率最低、成本最高的国家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因而也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学说反映了当时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反映了机器大工业的需求,它既为当时英国扩大国际市场的要求服务,也为其他国家提出了一种贸易方面的理论依据。比起亚当·斯密,李嘉图更彻底地否定政府的作用,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彻底鼓吹者。^③

如果经济自由主义是古典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那么人口原理便是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块基石。1798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版了《人口原理》,反对戈德温(William

^①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3页。

^② 同上书,第294页。

^③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晏智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

Godwin)和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的极端乐观主义。这两位哲学家在法国大革命的鼓舞下觉得社会邪恶即将被消除,因而描述了一个没有战争、痛苦和悲伤的世界。马尔萨斯认为戈德温—孔多塞幻想简单到令人生笑,他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例增加”。^①“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②因此应该控制人口,节制生育,才能保证人类的整体生存。这个思想本来是十分有见地的,提出了人类生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但马尔萨斯赋予它极强的阶级色彩,他认为对富人来说,不存在生活资料紧缺的问题,因此富人不必节制生育,而对生活资料造成巨大压力的是穷人,穷人既懒惰又贪欲,以惊人的繁衍速度造成他们自己的贫困,因此,穷人不仅应该不生育,而且应该不结婚,只有这样才能把穷人从地球上消灭掉。“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很残酷。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需的……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的施舍,便结婚成家,那这些人就是受了不正当的诱惑,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教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③因此,马尔萨斯认为现存济贫法的弊害特别大。建议“完全废除所有现行的教区法,从而使英国农民享有行动自由”,“尽力削弱和废除所有那些与同业公会、学徒有关的制度”,“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④有产阶级对马尔萨斯理论十分欣赏,1834年,英国议会制定济贫法修正

^①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③ 同上书,第35页。

^④ 同上书,第37—38页。